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中华春秋

历史上的宰相

□ 徐问笑

宰相，作为古代政治制度中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力，其尊荣显赫之地位，四海之民莫之能比。然在不同的时期，宰相之官称亦不相同，被誉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便是以齐国上卿（国相）之身份辅佐齐桓公改革，一举奠定了齐国“春秋第一霸”之地位。

春秋之后，便是七雄并列的战国时期，而纵横家苏秦的出现，使得这段历史无疑有了更为生动的解读。以一人之身兼佩六国相印，单以数字论，苏秦堪称古今宰相第一人了。“脚踏两只船”历来是为人所诟病的，但苏秦的过人之处却在于，他是光明正大地朝秦暮楚，行谋略之事。他在游说秦惠王“连横”不成后，转而改弦更张，又以“合纵论”游说六国，竟然还真是让他成功了，一跃而成为六国之共相，以致“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然所谓“擅泳者必溺于水”，苏秦一生周旋于各国之间，后自燕去齐，因行反间之计，而落得个死无全尸之下场。

秦统一六国后，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即辅佐皇帝、总揽朝政，且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亡后，汉初沿袭了秦的宰相制度，丞相统率百官，集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于一身。西汉初期的丞相萧何，曾跟随太祖刘邦南征北战，“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其功冠众卿之首，有“开国第一侯”之称。刘邦攻破咸阳城后，当诸将皆为秦宫的金帛财物和美人动心之时，唯独他想着将秦丞相御史府中有关国家法令、户籍、地形等图册档案统统收藏起来。正是他的这一远见之举，使得日后楚汉相争之中，为刘邦能够凭借对关塞险要、人情风俗的了解，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刘邦平定天下后，却大肆屠戮功臣，萧何虽高居丞相之位，却亦是如履薄冰，不但不敢有半点集权之动作，甚至不惜自污以求保身。但他卓越的治国才能和政治远见，使得他去世后，继任丞相的曹参“举任无所变更”，一切公务悉照旧章，而天下太平，因此后世亦有“萧规曹随”之说。

相权达到最强盛期，乃是文、景二帝之时。文帝宠臣邓通，因怠慢丞相申屠嘉，而被檄召至丞相府，欲以“大不敬”之罪斩首，邓通大惧之下，磕头告罪以致出血，而丞相却依然怒气不消。后在文帝说情之下，邓通才得以无事。史书记载，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可见其时丞相的权力之大，在皇权面前，亦可分庭抗礼。名相陈平亦是开国功臣之一，因精于奇谋善变，而立下不世功劳。然高祖、吕后在世时，陈平只能唯唯。后来，他联合周勃平定诸吕之乱，匡扶汉室，迎立代王刘恒为文帝，其声威更是达到极点。庶子登位，本就底气不足，何况文帝天性仁厚，面对陈平、周勃这样的元老级功臣，自然十分谦让。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来，为加速中央集权，一边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一边在中央压制相权。他频繁黜杀丞相，且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之难以坐大结党。汉武帝一生，共任命十三位宰相，然而得到善终的却寥寥无几，故公孙贺被任命为相时，竟吓得不敢受印绶，跪拜不起。但刘彻这个人，可能少年登基，受窦太后压制多年，一旦皇权完全在握，根本就是为所欲为，绝不允许有臣子逆其半分。所以可怜的公孙贺纵使不情愿，亦只能战战兢兢地登上了相位，且最终未能避免被杀之命运。终武帝一朝，只有宰相公孙弘，因任相时年岁已高，且出身低微，故能一直宠信不衰。

东汉时以大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共掌政事，备位宰相，实权已移至尚书台。譬如有“五卿七相”之称的胡广，有其名而无其实，历事六朝，史称“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却只能奉行中庸之道，唯求自保也。直至东汉末年，曹操罢三公，置丞相，所以世称曹丞相。

中国传统文化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丞相绝对称得上一号反派人物了，虽则他雄才大略，但民间之评价却历来是贬损有加。譬如在京剧演出中，素以脸谱化来体现一个人的忠奸与好坏，而寓意奸诈阴险的水白脸，其代表人物历来公认为曹操，可见世人对曹操的丑化已是不遗余力。同样是以丞相之名，而行天子之实，曹操为天下所诟病，而诸葛亮却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却为世人推崇备至。

诸葛丞相能够大权独揽而天下不忌，主要还是因为名正言顺。后主刘禅是大家公认的无能之辈，而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甚至有“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遗言留下。君信臣至此，古今少有也，而诸葛亮亦不负刘备之所托，一生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前后两篇《出师表》即是其忠心辅佐的最好体现。同时期的孙权亦盛赞他“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可见他忠君之竭诚，才干之出众，已是何等深入人心！

隋、唐时期，以三省长官取代三公，成为宰相。唐初宰相没有文人、武士之限制，房玄龄、杜如晦是文人为相，而李靖是将领出身。武则天执政之后，科举取士成了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而宰相之位置则逐渐为科举进士所把持。唐朝名相辈出，仅贞观年间就有数位，而后世史学家在评价这些名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他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并参与玄武门之变，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语）。他的最大特点便是善谋，而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则处事果断，难得的是，二人才高却不相妒，反而能够同心辅政，故亦有“房谋杜断”之称，此二人堪为后世良相之典范。

到了宋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但相权较之与汉唐时期，已然差之甚远。宋太祖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遗诏，且不涉谋逆，刑不上士大夫。然而，恰恰在“开明”的宋朝，将有宰相制度以来，宰相曾独享的礼遇，即“坐而论道”的资格给取消了，更别说汉唐时开国名相甚至有佩剑上殿之殊荣了。陈桥事变后，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周范质、王溥等宰相迫于形势勉强拥立他登基。然他们虽留任宰相，但相权却受到极大之限制，某日议政时，宋太祖更是趁范质、王溥不注意，撤去了宰相的座椅，从此他们只得与百官一样，都是站着与皇帝议事了。此后，终宋一朝，宰相们也都不复享有这种有别于百官的特殊待遇，在皇权面前，只能俯首听命而已。

对读书人而言，宋朝提供了相对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这亦是一个名相迭出的朝代。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澶渊退敌”的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堪称一代名相。其中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曾两度拜相，虽因主持变法而成为历史争议人物，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国家积贫积弱之境况。后来新法虽被废，但王安石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的改革精神却是值得后世之人敬重、仰望的。

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是明初的胡惟庸，他的结局非常悲惨，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以“谋不轨”之罪诛其九族。此后，太祖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并下令后世不许再设丞相。这项举措，在加强了专制皇权的同时，亦标志着在中国施行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正式结束。有明一代，虽成立内阁，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并非正式的官僚机构。

相权归于皇权之后，使得万历年间的一位猛人，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且有“大明脊梁”之称的张居正，虽功在社稷，却亦饱受当世之人的攻讦。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然张居正虽位列内阁首辅，但毕竟不曾真正拥有宰相的权力，而他为了改革能够顺利推行，行使的却是相权，亦即是今日之皇权。故他当国十年，所揽之大权，却是万历之大权，故有明一代，又称其为权臣，认为其有窃权、专权之嫌。这也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说他“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且残害其家人之缘故。然谋深如张居正者，又如何不知自己之尴尬处境，可正因为他心怀天下、有谋国之忠，才明知自己“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哪怕粉身碎骨，亦浑然不顾了。不过，明朝皇帝所吝于给张居正的肯定，由历史予以正名，他不但有“救时宰相”之历史评价，甚至清初有人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有所思

寇准的幸与不幸

□ 王兆贵

最早知道寇准这个历史人物，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流传很广的杨家将故事改编的戏曲片，名叫《寇准背靴》。这段虚构的剧情，将寇准借吊唁之机，私下里刺探真情的举动，刻画得惟妙惟肖。其实，历史上的北宋名相寇准，与杨延昭素未谋面，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可能亲临天波府邸，背靴暗访，察明真相，向皇上吁请杨延昭复出抗辽呢？后来又有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寇老西儿》上演，反映的是他不畏强权、秉公断案的故事，剧情或多或少也有些虚构。因为上述故事均出自民间传奇色彩甚浓的《杨家将演义》。

于史有据的寇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十九岁那年，与大他四岁的王旦同榜录为进士，且同朝为官，因此互称同年。寇准性情张扬，耿直率真；王旦低调内敛，胸怀大度。

寇准心里藏不住话，曾在皇上面前数揭王旦之短，而王旦则总说寇准之长。一天，宋真宗对王旦说，你尽管常夸寇准的好处，但他却专挑你的毛病。王旦回答：“理固当然。臣居相位久了，政事缺失必然多些。寇准对陛下能无所隐瞒，可见他的忠直。这也是我所看重并保举他的原因。”由此，真宗更加赏识王旦的贤德。

当时，王旦掌中书省，寇准掌枢密院。中书省有文送枢密院会签，寇准见不合诏令格式，就把这事捅到皇上那里，王旦因此受到责问。王旦不但没介意，还到枢密院登门检讨、致谢，并对相关办事吏员进行了责罚。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送中书省，也不合诏令格式，办事吏员高兴地呈给王旦，可王旦却令其送回枢密院更正。寇准深感愧疚，见王旦说，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度量呢？王旦也没说什么。当寇准被免去枢密使职位后，曾托人私求王旦举他为使相（节度使、同平章事，并称于宰相）。王旦诧异地说，将相重任，岂可求得？我不接受私请。寇准不悦，深以为憾。事隔不久，皇上授予寇准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寇准入朝叩谢说，若非陛下知遇，臣哪有今日？皇上说，这是王旦力荐的结果。寇准愧叹，自觉德量远不及王旦。

王旦为相期间，宾客满堂，但从不接受私人请托。经察可以交谈及素知其名者，数月后就予以召见谈话，询访四方利弊，或让他们书面呈报上来。发现才有所长者，默默记下名字。其人如果再来，就不必再见了。后人整理、修订史料时，从王旦的奏折和皇上的批阅中发现，朝廷许多栋梁之材，都是王旦举荐的。什么叫“荐贤贤于贤”，王旦就是个榜样。

王旦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用轿子将王旦抬入禁宫，忧心忡忡地对他说，爱卿万一命有不测，朕将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王旦说，知臣莫若君，唯明君能够选定。皇上再三询问，王旦才勉强举起笏板说，以臣愚见，莫若寇准。王旦病逝不久，真宗果然启用寇准为相。

寇准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与自己同榜入朝的好同年。但是，这种幸运并非常有。寇准曾同丁谓交好，认为他颇有才干，屡次向李沆举荐，李沆不予任用。追问起来，李沆说，看他为人，能让他居于别人之上吗？寇准说，那也不能一直压着他呀。李沆笑着说，等你将来后悔时，就会想起我的话。当初，丁谓在寇准门下供事时，对他很是恭敬，爬上了高枝后，对他一再倾轧，寇准这才佩服李沆高明的察人之识。寇准秉性刚直，说话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寇准曾同丁谓一起在中书省聚餐，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溅了些羹汤，就起身慢慢为其拂拭。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乃国之大臣，是为官长擦胡须的吗？按说这不过是句玩笑话，但在丁谓看来，这是有意羞辱他，于是记恨在心，寻隙打击报复。此后的日子里，丁谓对寇准的构陷和挤兑变本加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致使寇准一贬再贬，一直放逐到当时的蛮荒之地雷州。丁谓也因此为后世所诟病，斥之为“奸邪之臣”。

寇准一生几起几落，幸与不幸交替发生，都同他遇人淑与不淑相关。遇到像王旦这样心地坦荡、宽宏大量的人，就认为他刚直不阿，有胆有识，举荐他，擢拔他；遇到像丁谓这样心地狭窄、小肚鸡肠的人，就认为他刚愎自用，不谙世故，诬陷他，打压他。那些心理阳光、坦荡正直的人，无论职位高低，都能谦恭自守，公平待人，默默奉献，慎始善终；那些心理阴暗、变态畸形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就会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多行不义，走向极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官员的心理素质是影响其从政行为的潜在动因。

幕宾佐治的心理隐忧

□ 鲍家树

幕宾，又称师爷，泛指中国古代各级官员为处理行政事务而敦聘的佐理人员，在清代，这一群体尤为活跃。幕宾来源广泛，流品芜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考运不通、屡踬场屋者，迫于生活压力，他们不得不暂时搁下四书五经，选择加入幕业。

为什么这些学而未仕者不选择其他行业而选择幕业？其中不乏工作性质、薪酬待遇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幕宾群体的心理缺陷也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动因。士农工商，古之四民。理论上讲，仕途不顺，他们还可以从事后三种职业，但是事实上，务农、做工、经商，在他们内心深处，都被视为贱业，不会选择去从事。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与观念的斟酌，体现为不屑。从事这些工作，严重违背了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拿经商来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做生意，有两个缺陷是致命的：一是清高孤傲，不愿意随俗；二是患得患失，经不起失败。未能实现科举的“文化”成为了他们的心理负累，使其无法做到一身轻松、了无牵挂，这也埋下了幕宾群体心理隐忧的种子。

虽然苦坐寒窗的学子在名落孙山时，能够从事幕业、介入机要，不失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正如清朝名幕汪辉祖所讲，“仕而进，经也；不获已而退，权也”。“跛者不忘履”，虽然退而入幕，但“究以入仕为贵”。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幕业，只是短暂逗留；科场，才是无限神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显身扬名，这几乎是每一个幕宾的夙愿。只要一遇科考，幕宾就会迫不及待地尝试，将心中强烈的热望和执着的追求付诸实践，但纷纷士子中，“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可见，金榜题名、最终如愿者总归是寥寥无几。为官之念无法释怀，加之束脩不足、竞争激烈、聘期不稳等情形，幕宾生活多不如意。

“天下文章出幕府”，不仅文章，实际上，衙门公事很多都是由幕宾操办。评文笔、论能力、理琐事、制宏图，幕宾往往远在州县官之上。然而，幕宾却不得不为他人作嫁衣裳，将文告、计谋拱手相让，州县官也以幕宾之功为己功。不可否认，幕宾确实受到了州县官的礼遇，情谊亲洽，礼貌周到，“师爷不到不可举箸”，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的敬重，其所谓的“礼遇”，都是基于幕宾自身的能力，超礼遇的对待丝毫没有。宾主相待的本质是雇佣关系，被雇佣与雇佣的身份，是现实存在的高下状态，这样的状态与幕宾内心的角色预设明显错位，心理落差凸显。

绍兴市至今保留有许多幕宾故居，庭院幽深，相对封闭，整体结构迂回复杂，难有阳光照进，屋内陈设也很简朴，离妻别子，萍踪飘零，足见幕宾生活之清贫。更有甚者，客死他乡，身后凄凉。特殊的工作经历促成幕宾独特的佐治心理，而独特的佐治心理又直接影响着其行为实践。这些失意的文人群体处于被礼法和政治双重否定的境地，没有归属感和成就感，才华不展的苦楚、顾影自怜的悲伤、寄人篱下的无奈、郁结万缕的乡愁，都只好默默品尝。汪辉祖曾提出，“课徒可以进业，贸易可以生财。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人才……未成者可改则改，已业者得休便休”。除非势不得已，否则他不希望子孙后代从事幕业。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余某者老于幕府，司刑名四十余年，后卧病濒危，灯月下恍惚似有鬼为厉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此鬼胡为乎来耶？夜梦数人浴血泣曰：君知刻酷之积怨，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也”。可见，幕宾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

心理的重荷、价值的失落，是幕宾无法清贫自持、洁身自守的重要原因。他们千方百计地改变辕下之驹的地位，然而，当通过合法手段争取无果时，压抑、狂躁、怨恨、嫉妒、暴力、偏执、自恋、冷漠等心理就会迭次发酵，利禄观念日益强化，幕宾的职业价值取向最终陷入功利化，最大限度地干政渔利以平衡其空虚的心理，舞弊行为便不可避免。

“理事之余，当温习故业，以图北闱之隽”。这是清朝名幕龚未斋对自己的劝勉，也是对侄儿龚甘林的寄语。人生在世，向上、进步，是值得称道的举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切记调适心理、端正心态，万不可带着心病攀爬事业的高峰。

史镜

传递爱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 路文彬

众所周知，教育的目的是要让人变得更美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但是，这美好却并不取决于学校里的那些优等生，相反，它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那些差等生。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上的木桶原理，木桶容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的，而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同样，我们社会的好坏，常常也是从那些为我们一直所忽视甚至冷落的人身上显现出来的。基于此，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懂得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类学生那里。教学上的成绩不能只看最高分和平均分，而应更关注最低分的实际情况。让落后的学生变为优秀，而不是让优秀的学生更加优秀，这才是值得肯定的教学成绩。教师不是教练，不能唯分数是瞻，唯分数论的教育已然不是教育，乃是弗洛姆所说的一种异化的占有式学习。

弗洛姆将人的生存方式分为“存在”和“占有”两种，他认为：“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对于一个人来说，幸福就在于他能胜过别人，在于他的强力意识以及他能够侵占、掠夺和袭击他人。而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中，幸福就是爱、分享和奉献。”毋庸置疑，教育是属于存在层面的，否则它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可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却极少顾及人生的存在旨趣，一味注重的只是无止境的数量上的占有。知识被我们置换成了分数和金钱，是我们借以战胜他人的资本。我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心灵，而是建立在针对他人的优势上。看到别人失败，我们就会有成功的快感。在通往强大的道路上，冷酷甚或是邪恶成了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知识的占有，实际上就是对知识的消费，这同时亦是对我们自身的消费。也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与创造和丰富无关，归根结底与爱无关。优异的学习成绩只不过是证明了一个学生对于分数的格外看重，而且他亦往往因此疏忽了对其自身健全人格的多方面培养。再则，他的成功也极有可能就是暂时性的，我们历届高考状元最终所显现出的平庸无奇不是已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写到这里，我恰好看见这样一则发生在南方一所中学的新闻：一位年轻美丽的音乐老师在监考期间突发疾病，趴在讲台上呻吟着死去；然而全班几十名学生却无一人起身过问，他们照旧不动声色地完成着自己的试卷。他们不关心老师的生死，只关心自己此刻的考题。不过，这一可怕事实昭示出的应该不仅仅是学生同老师之间的关系现状，我相信即便换成他们的父母，无动于衷的也会大有人在。这些学生在长期占有式的学习过程中，已经逐渐异化为学习和考试的机器，进而丧失了人性的基本感知能力。他们的心中只有成败，没有爱与关怀，生命远远没有自己的一场考试来得重要。可是，即便他们能够当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人生的一次意外考试却已注定零分。由此我又不禁想起1990年代初震惊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制造的那场血案，这名高才生仅是因为出于对另一名同学成绩的嫉妒，便可拔枪大开杀戒。显而易见的是，卢刚所受到的教育只是成功论的教育，学习的过程即是战胜他人的过程，一旦失败生命便没有了任何意义。毫无疑问，每一位教师都不会认同卢刚这样的高才生，但不可否认他就是我们多年教育理念所招致的恶果。

对于这些惨痛的事例，为人师者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我们必须明白，仅仅传授给学生们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应是使其懂得对于知识的爱，只有这种爱才会赋予他们从容面对挫折及乐于助人的力量。而且，知识也只有通过这种爱才会获得生命的光和热，进而照亮和温暖人性世界里的寒夜。我们可以相信榜样的力量，但却不能因此就将自己的目光永远停留在高处。不要忘记，我们更应相信的仍是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仅在我们心怀谦卑俯身向下凝望时，方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随想录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瑞鹿祥和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